

孙中山和他的老师康德黎



康德黎(James Cantline, 1851-1926)英国人。阿尔伯特大学毕业。曾任外科医生。1889年~1896年任香港西医学院教务长。他赏识该书院优秀学生孙中山。孙中山在澳门镜湖医院行医期间,常从香港赶来帮助做重要手术。回国后任伦敦市议会顾问医生。

1896年10月17日在获悉孙中山被清驻英使馆绑架的消息后,康德黎立即全力营救,首先报告警察当局,后又报告英国外交部,并雇请私家侦探在中国驻英使馆门外守候监视。

19日按外交部通知具文报告孙中山被绑架情况。22日《环球报》披露孙中山被拘捕的消息。次日清使馆被迫释放孙中山。随后又帮助孙中山撰成《伦敦蒙难记》。此后与孙中山一直维持深情厚谊。1921年著《孙中山和中国的觉醒》,在伦敦皇家热带医药卫生协会创办的《热带医学评论杂志》上发表。

1896年10月,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蒙难获释,曾经轰动英伦。从此,孙中山的名字更为世人所知。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述:“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人之口,实始于是地。”伦敦的死里逃生,对孙中山以后的革命生涯确实发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人们每当纪念辛亥革命或孙先生生平之时,都不会忘记曾经营救过他的英国老师詹姆斯·康德黎以及其他英国朋友。

提到孙中山和康德黎的师生之情,还得从中山先生在香港求学谈起。1887年,孙先生21岁时,由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转学到香港西医学院即雅丽氏医院附设医大就读。入校后,他结识了英籍外科医生、该校创办人康德黎教授,师生交往弥密,感情甚笃。1892年7月,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在该校毕业,又是第一届毕业生,深得康德黎器重。康德黎曾亲自为孙中山颁发了博士文凭。毕业后,孙中山即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并从事革命活动。1895年10月,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逃往香港,重访老师康德黎,随即东渡日本神户,并由横滨转赴夏威夷群岛,就寓于檀香山。在赴檀香山的路上遇见回国途中的康德黎夫妇。他们给孙中山留下了伦敦的住址,师生依依惜别。

1896年6月,孙中山考虑“久留檀岛,无大可为”,就毅然离开檀香山赴美国旧金山。三个月后,乘轮船“麦竭斯”号东行至英国利物浦,10月1日到达伦敦。第二天,孙中山来到康德黎寓所,师生在欢乐中重逢。康德黎夫妇殷勤款待,并安排孙中山迁居到他们寓所附近的葛兰旅馆。那时节,清政府正在到处缉拿孙先生。它曾命令驻英公使馆“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死活不论”。10月11日(星期日)上午十时半,孙先生由葛兰旅馆去老师住处途中,清政府驻英使馆的歹徒竟悍然违反国际准则,将孙先生秘密绑架,囚禁在使馆三楼一间窗户有铁栅的斗室里。中山先生被囚后,急于把自己的处境告诉康德黎老师,曾托使馆英国工人送信或用信纸裹着银币向窗外投掷,但屡试均遭失败。自此,使馆对孙中山的看守更加严密了。身陷囹圄的孙中山先生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使馆对他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都一一破产。这时,清驻英使馆根据清政府密令,正阴谋用7000英镑的高价,租一艘2000吨的轮船,把孙中山装入一只特制的木箱内,准备几天后秘密押运回国处死。

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和危险处境感动了使馆英籍清洁工人柯尔。10月17日晨,柯尔冒着危险为孙中山送信。当天深夜,由柯尔之妻秘密投书康德黎住宅,大意是:“君有友自前星期日来,被禁于中国使馆中。使馆即拟将其递解回华,处以死刑。……如不急起营救,必将罹难。”第二天,柯尔又亲自将孙中山用英文书写的两张名片面交康德黎,内容是:一、我于星期日被绑架到中国使馆,将被偷运回中国处死,请急速救我;二、目前请照应这个送信的人,他很穷,为了替我做这件事,他难免失业;三、中国使馆已雇一船,载我回中国去,我沿途将被封锁起来,不能与任何人通消息。

康德黎17日深夜得知孙中山被绑架后,连夜赶到苏格兰场警署,请他们出面干预此事。第二天,他又约孙中山在港相识的英籍朋友孟生医师同去外交部,报告清政府使馆非法绑架、囚禁孙中山事。但是都无结果。康德黎又到清驻英使馆交涉,更遭冷遇。他们两

人心急如焚,深知稍有迟疑,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们果断地一面由孟生告知清使馆:囚禁孙中山已为外人所知,英国政府和伦敦警察署将出面干涉。一面由康德黎驱车至《泰晤士报》馆,拟约见该报记者,详细揭露清使馆在英国侵犯人权事件的始末。同时,康德黎为防止清使馆提前行动,又雇了私人侦探,坐在离使馆大门不远的汽车里,注视着使馆的一举一动。过了不久,孙中山从柯尔送来的煤篓里收到一张纸条,带来了令人高兴的消息:“勉之,毋自馁!吾政府正为君尽力,不日即可见释。康德黎。”这一夜,孙中山在囚室里安睡了。

10月19日中午,康德黎按英国外交部的通知将其学生被囚经过上报。英国外交部经过调查,得知清政府使馆确已向格来轮船公司租船,证实了康德黎的申述。于是,英国政府在舆论压力下,派了6名警察守候在清使馆门外,加以监视。10月22日,英国《环球报》以《惊人消息!》为题,首先披露了中国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事件。《中央新闻》、《每日邮报》的记者纷纷来访康德黎。接着,伦敦各报均以特大标题相继报道了清廷使馆的这一丑闻。消息传开,广大同情中国革命的伦敦市民拥向清廷使馆,强烈抗议清廷的非法行径。清驻英使馆在各方舆论压力下,被迫同意释放孙中山。10月23日,康德黎迎接恢复自由的孙中山。当孙中山走出使馆后,在伦敦街头热情的英国人民向孙中山挥手致意。孙中山则向报界和公众揭露、控诉了清政府绑架的卑鄙阴谋。孙中山获释后,曾投函伦敦报纸,对各界在他蒙难时相助表示感谢。1897年,他在伦敦用英文撰写了著名的《伦敦蒙难记》,书中谈到他的老师为营救他而全力四出奔出,“不禁感极而泣矣!”

康德黎的晚年,由于营救孙中山成功而受到尊敬。他曾任伦敦市议会顾问医生,1921年在伦敦设立皇家热带医药卫生协会,发行《热带医学评论杂志》。1925年,孙中山因病不幸逝世后,他还拖着年迈的身体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中山先生追悼会。1926年,康德黎也离开人世,享年75岁。

(据《人民政协报》)

王尽美在山东一师

王尽美,1898年6月14日生于山东莒县大北杏村(现属诸城市)一个佃农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曾在地主家为其子弟陪读。

1918年秋,王尽美20岁,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1919年,他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挠,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诞生,他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秋,他与邓恩铭等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王尽美任主编。《励新》杂志,肩负着时代使命,积极传播新思潮、新文化,抨击时弊,启发青年觉醒。

1921年春,他倡议组织了“劳动周刊社”,出版《济南劳动周刊》,并与邓恩铭一起秘密组织济南共产主义小组。7月,他与邓恩铭同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由此更名“王尽美”,寓意在于为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献身革命的决心与信心。

然而,当时王尽美的公开身份,依然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参加中共“一大”后,由沪返济,迅速建立起了中共山东支部,后根据工作开展的需要,旋即建立起中共山东省委员会,王尽美任书记。当时他不仅在校内活动,而且还经常到其他学校和工厂中去,深入青年学生和劳苦大众开展工作。为了避开校方监督的视线,他常常是白天在校内工作与学习,夜晚翻越校墙到外边活动。但时日久了总难免走漏风声。校内以反动学监徐禹臣为首的一班人,渐次觉得将如是一个“危险分子”留在学校,对其大为不利,便总处心积虑地想把王尽美开除出校,但他们又思及,王尽美系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一旦轻率除名,不仅社会舆论哗起波澜,本校师生亦会坚决抵制。

然而,进入1921年冬天,学校当局终于把王尽美开除出校了,借口和导火线是:王尽美在学校壁报栏内发表了一篇题为《饭碗问题》的讽刺文章,直接揭露徐禹臣以办教育自诩清高,实则专事钻营,唯利是图的伪善面孔。王尽美的文章写得辛辣犀利,将一个伪君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揭去他道貌岸然的盖头,让一些受蒙蔽的学生,识其真相。

自此,王尽美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但他并未离开学校。有时白日不便就晚间来,抑或越墙出入,在他的帮助下,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们建立起了党的组织。

这一时期,王尽美还创办了一个半公开的学术研究团体——“平民学会”,以研讨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由于王尽美的宣教发动,第一师范的大部分师生都成了平民学会的会员。

王尽美与广大师生亲密无间,因他长着一对特大的耳朵,同学们都亲昵地称他为“王大耳朵”。王尽美每每面带微笑,幽默地说:“我的智慧和才思,都在这一对大耳朵里呢!”王尽美确乎是正义和睿智的化身,他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留有一副楹联,可为佐证:

自由花鲜血浇出
凯旋门白骨堆成
(据《人民政协报》)